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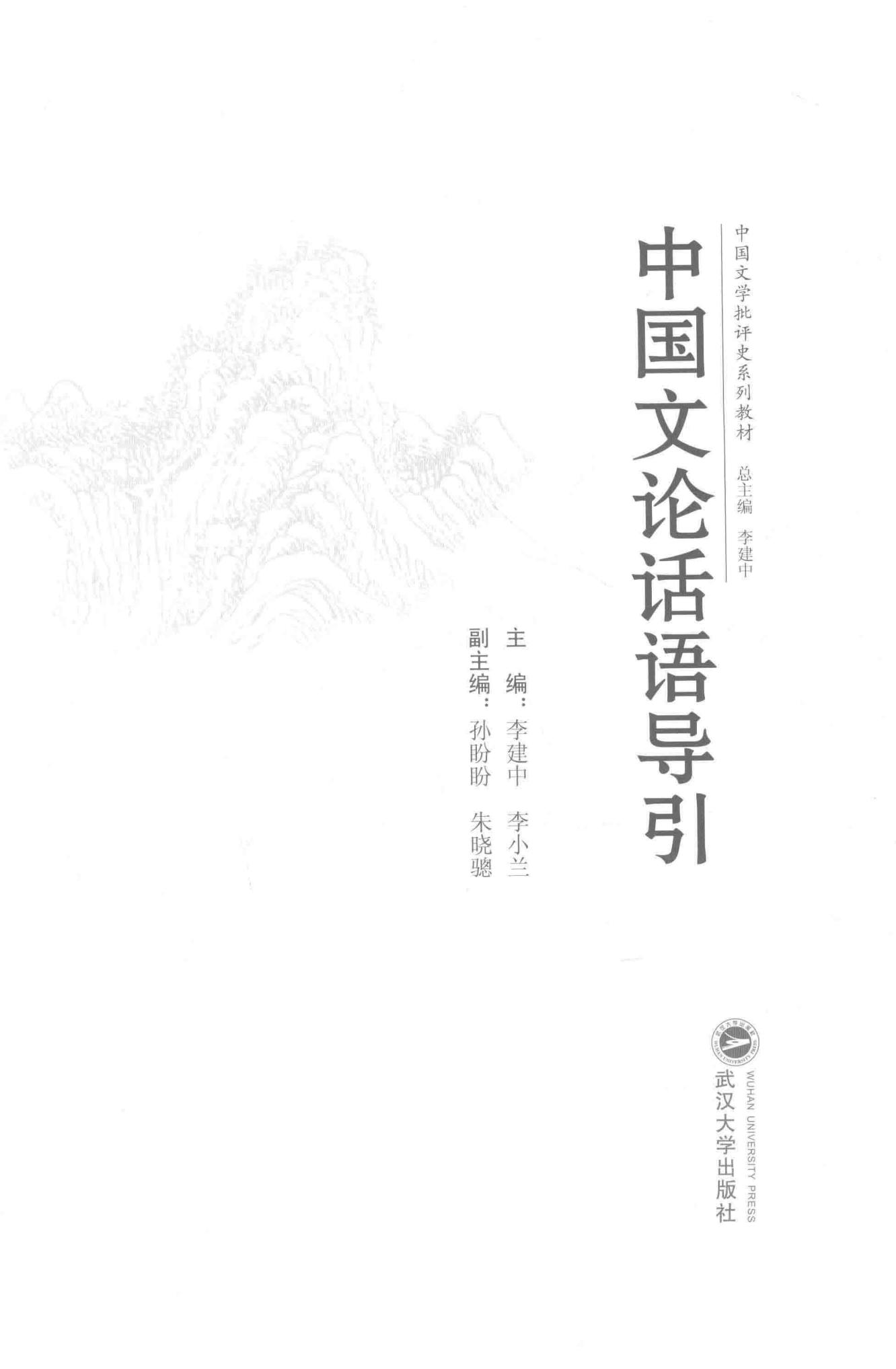
中国文学批评史系列教材 总主编 李建中

中国文论话语导引

李建中 李小兰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禁书借



中国文学批评史系列教材

总主编
李建中

中国文论话语导引

主编：李建中 李小兰
副主编：孙盼盼 朱晓骢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论话语导引/李建中,李小兰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8

中国文学批评史系列教材

ISBN 978-7-307-20129-3

I. 中… II. ①李… ②李… III. 中国文学—古代文论—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8637 号

责任编辑:郭 静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9.25 字数:458 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20129-3 定价:49.8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自 1927 年陈钟凡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至今已近百年。百年荏苒，时运交移，21 世纪的读者，有幸能够读到各种体例、各种风格乃至各种学术观念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这其中既有学科草创期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先生的开山之作，亦有学科成熟期侯敏泽、张少康、蔡钟翔等先生的扛鼎之作，更有自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兼具专著和教材双重性质的厚重之作。从 1989 年开始问世，到 1996 年全部出齐，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全面清理各历史阶段文学批评发展过程，科学评价历朝历代经典理论家及批评经典，努力发掘新的材料，整体展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多彩和灿烂成就。21 世纪初，笔者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紧紧扣住中国文学批评与儒道释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学批评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粹，力图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层面揭示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2006 年，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注重批评史与思想史、哲学史以及美学等相邻人文学科的联系，着力彰显批评史中深挚博厚的人文精神，实现国学蕴涵与现实人生的深度贯通，以及文献与思辨的有机结合。两年后，笔者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问世，武大版在保持华师版“文化视野”的同时又新增“文体观照”，亦即从批评文体的角度，重新清理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每一章的概述部分，辟专节介绍本时期批评文体的时代风貌，分析本时期文学批评在文体样式（体裁）、批评话语（语体）和批评风格（体貌）等方面的特征。翌年，笔者新推出“北大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除了基础知识的讲述之外，新增三大板块：问题研讨、导学训练和拓展指南。此举旨在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质疑精神，提高学生的理论思辨和学术研究能力，并且为学生的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提供相关学术史背景和最新学术进展的文献目录。2014 年，李春青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印行，是书以“求真”为宗旨，不仅是资料整理层面的求真，而且是更深层次的“追问意识”上的求真：古代文论话语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它的实际的社会功能与意识形态功能究竟是什么。这一求真路向，表现在方法论上则是：“对话”的言说立场，跨学科的互文性视野，以及语境化的操作方法。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中国文学批评史”（亦称“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论”），可谓“体貌英逸，俊才云蒸”，一大批勤奋而又新锐的学者在此领域“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诸多颇有影响的学术论争或命题（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论失语症”、“青春版文心雕龙”等）均由此领域发轫；作为一个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则是松散的甚至是名实乖离的。因为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下，“中国文学批评史”已经不是一个二级学科，她或者归于“文艺学”，或者归于“中国古代文学”。这种“游离”状态反倒赋予她更多的学术自由

和更大的理论空间。这也就是前述种种体例、风格或学术观念的批评史得以纷纷问世且能并行不悖的深层缘由，也是我们这一套“中国文学批评史系列教材”得以出炉的现实原因。

笔者在大学讲坛上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已有 33 年，积 33 年之教学经验以及主编三种“批评史”教材之学术心得，笔者以为：大学讲坛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授或传播，至少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原始表末”式。当年刘勰撰著《文心雕龙》，概述“本课题研究现状”时，认为“近代之论文者”的通病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因此，刘勰论文自定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原则便是“原始以表末”。讲中国文学批评史，首要任务当然是原“始”。问题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始”在哪里？受西方近现代“文学”观的影响，中国文论一般将“魏晋”（亦即鲁迅所言“曹丕的一个时代”）视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加之《四库总目》集部的“诗文评”提要称“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由此看来，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从魏晋开始的？那么先秦（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怎么办？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文学批评”这一术语虽说是从西方传入，但作为“批评”的对象，汉语的“文学”与西语的“Literature”从内涵到外延，从词根到语用，都是大不一样的。“原”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始”，不仅不能止于“曹丕的一个时代”，甚至也不能止于“轴心时代”，而是要返回《文心雕龙·原道》篇所说的“人文之元”，亦即“河图洛书”的时代。找到中国文学批评真正的“元”（起源与本原），才能说清楚她的流变或走向，诸如：先秦两汉儒道文化背景下的文论创生，魏晋南北朝佛玄合流中的文论新变，唐宋的三教融合与文论多元，元明清的文化总结与文论繁荣，乃至近代西学东渐与文论转型。

二是“洪范九畴”式。据《尚书·洪范》记载：鲧堵塞洪水，扰乱五行之陈列，“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等到鲧之子禹继起，治好了洪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结果是“彝伦攸叙”。中国文学批评史讲“范畴”，大多要追溯到《尚书》的“洪范九畴”，《洪范》篇所列举的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五福、六极等，是夏禹治理国家的基本范畴和范畴体系，夏禹在治水之后用这些范畴治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故《文心雕龙·原道》篇在讲述上古文明史时对此事大加赞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如果我们跳出单一的历史叙事，在一个多元的层面作隐喻式言说，则可将《尚书》的“天乃赐禹洪范九畴”理解为：上天为圣贤恩赐兼具规律性和可操作性的基本范畴和范畴体系，以助其成功。鲧未能得到范畴，他失败了；禹得到了范畴，他成功了。治国如此，论文亦然，就后者而言，刘勰的成功，是构建并诠释“范畴”的成功，是折中并运用“范畴”的成功。我们看《文心雕龙》五十篇的篇名，大多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核心范畴，如“神思”、“体性”、“风骨”、“通变”、“情采”、“声律”、“比兴”、“隐秀”等。在课堂上将这些范畴讲清楚了，也就将《文心雕龙》讲清楚了，也将中国文学批评史讲清楚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个提纲挈领且能事半功倍的方法，就是“洪范九畴”法。作为在大学校园研究并传播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师，真的要感谢“天乃赐禹洪范九畴”，有了“范畴”，我们才有可能“彝伦攸叙”，也才有可能“勋德弥缛”。

三是“尚友古人”式。儒家的孔子和孟子都看重交友，《论语》开篇便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常讲“益者三友”或“损者三友”。孟子对万章说：“一乡之善士，斯

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可见最高的善士是要“尚友古人”的，如何“尚友古人”？“颂其诗，读其书”也。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过程，是一个“尚友古人”的过程，是一个“知音”的过程。然而，知音其难哉！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感叹：“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我们今天若要与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交朋友，若要成为他们的千古知音，除了“读其书”别无他途。说到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尚友古人”，我们要感谢郭绍虞、王文生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十年浩劫之后，有志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学人，无一不是借此书“尚友古人”从而登堂入室的。我们前面谈到的“原始表末”和“洪范九畴”两种方法，落到文本的实处，还是要“读其书”，精阅经典而“尚友古人”。由此亦可见出，我们讲的三种方法是互通互济、相得益彰的。

这套“中国文学批评史系列教材”，首批推出三种：《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属于“原始表末”式，而《中国文论经典导读》和《文心雕龙导读》，就编撰体例而言属于“尚友古人”式，而解读方式则属于“洪范九畴”式。因而，这套书的广大读者，无论是将之视为教材还是视为学术著述，若能既将三种读本相互参照，又将三种方法交互使用，则可以有意外之收获。

《礼记·学记》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作为高校教师，我们的“所知之困”，是如何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最有效地也是最大限度地激发起学生的学术兴趣，使学生成为“善学者”和“善问者”。《礼记·学记》说：“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又说：“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可见与“善学(问)者”一道，才能真正实现“教学相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礼记·学记》引用《尚书·说命》的话说：“学学半。”第一个“学”字读作“效”，意谓“教”：教别人，自己也能收到一半成效。这是何等有趣味的事情，难怪乎梁启超要说“教师是一种最有趣味的职业”。希望我们这套系列教材在为广大读者提供知识和思想的同时，也能为读者平添几分兴致和趣味。

李建中

2015年7月

目 录

绪论 中国文论话语阐释的四项基本原则.....	1
-------------------------	---

本体论话语

文学.....	7
言志	16
缘情	27
意象	37
文以载道	47

创作论话语

神思	59
感应	68
叙事	77
虚静	87
立象尽意	96

文体论话语

体.....	107
诗.....	116
赋.....	126
曲.....	135
小说.....	145

修辞论话语

比兴.....	157
隐喻.....	166
详略.....	175
对偶.....	184
夸饰.....	193

风格论话语

文气.....	205
风骨.....	214
自然.....	223
含蓄.....	232
雅俗.....	242

鉴赏论话语

滋味.....	253
妙悟.....	264
品评.....	273
通变.....	282
知人论世.....	291
后记.....	301

附录与文

译文.....	303
注释.....	304
参考书.....	305
参考网站.....	306
作者简介.....	307

附录与解

译文.....	309
注释.....	310
参考书.....	311
参考网站.....	312
作者简介.....	313

绪论 中国文论话语阐释的四项基本原则

中国文论话语是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审美构成，是沟通中西古今文学理论批评的语义桥梁。《中国文论话语导引》分本体论、创作论、文体论、修辞论、风格论、鉴赏论等六大门类共精选 30 个核心关键词，依次在五个层面作话语阐释：一是语义界定、中西比较；二是语根追溯、古今演绎；三是语境还原、经典诠释；四是语用呈现、批评实践；五是敷理举统、意义揭示。为了举一反三、学以致用，本书对核心关键词的诠释，前有话题导入，后有问题思考。本书作为笔者总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系列教材》之一种，可用作高校本科生及研究生教材，亦可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

就其思想与方法而言，本书对中国文论话语的阐释，受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启发。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为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制订了“四项基本原则”：

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刘勰生活在五六世纪之交的南朝齐梁时代，彼时的文化背景是佛华交通、儒释道融合。1500 余年之后的 21 世纪，我们在中西会通、文史哲交融的全球化时代阐释本土文论话语，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当为《文心雕龙》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既是对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换，也是在思想与方法的层面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会通适变。当然，与西方文论相比，中国文论话语自有其独特的创生路径及演变历程；但是，在全球化时代阐释本土文论话语，我们势必要引入中西比较的视域。因此，我们在借鉴刘勰文论的“四项基本原则”时，对其顺序作了适当的调整：从“释名以章(彰)义”开始。

分述如下。

一是“释名以章(彰)义”。

本书分 6 大门类依次阐释的 30 个中国文论话语，是依然“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的 60 个关键词。所谓“关键词”是对英语 key words 的汉译，汉语“关键”一词的本义是内关门户、外键鼎耳，以键闭关锁喻指器物之宝贵，而英语的“key”则意指用钥匙开启。键闭与开启，既构成“关键词”的语义张力，又铸就“关键词阐释”的方法论密匙，对中国文论话语的“释名以彰义”正在键闭与开启之间。《中国文论话语导引》对 30 个文论关键词的阐释，既有逻辑层面的键闭式释名，亦有历史层面的开启式彰义，更有对二者的折中式辨析，即《文心雕龙·序志》篇所言“擘肌分理，惟务折衷”。比如对“文学”这一话语的释名彰义，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将汉语的“杂文学”与西文的“纯文学”作二元式对立，而本书释“文学”则是在对语义材料“擘肌分理”的基础上作出“折中”式辨析。《论语·先进》的“文学：子游、子夏”是“杂文学”，四部分类中的“经史子集”是“杂文学”；

但是，中国文学的演变过程是在逐步走着与今日世界所称文学者相合的道路，也就是说，不待西方浪漫主义运动后提倡“纯文学”，在中国固有的文学长河中，已经汨汨不断地流淌着“纯文学”的思想。事实上，一部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的“纯文学”作品，人们在解读这些作品或对“文”、“文章”、“文学”，乃至“诗”、“赋”、“词”、“曲”、“古文”、“小说”的特性作解说时，往往都注意到了它们的审美特性。如修辞论话语中的“详略”，风格论话语中的“雅俗”，鉴赏论话语中的“通变”等，均充满着折中和辩证的色彩。中国文论话语在今天的使用，也讲究辩证：既有“沿用”与“改造”的辩证，也有“通变”与“借镜”的辩证，而其“借镜”之中又有“顺借”与“逆借”的辩证，亦即纪昀所说“考证旧闻，触发新意”。

二是“原始以表末”。

当年刘勰撰著《文心雕龙》，概述“本课题研究现状”时，认为“近代之论文者”的通病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序志》篇），故刘勰四项原则的第一条是“原始以表末”。我们这一本《中国文论话语导引》，对每一个关键词的阐释，在简短的“释名以章义”之后，即为详细的“原始以表末”。本书在阐释中国文论话语时，重在追溯字义根柢并演绎文论关键词的语义流变。比如阐释本体论话语“言志”，除了按时代顺序讲清楚“言志”语义流变之外，还充分利用传世文书（如《说文解字》）和出土文物（如上博楚简《孔子诗论》）^①，讲清和“志”的原始意蕴，理清“言志”的三重内涵：一是“志”与“诗”或“识”通，是指“记忆”或“记录”；二是“赋诗”意义上的“诗以言志”，即对诗歌在特定时期独特功能的认定；三是后人通常所理解的对诗歌创作普遍原理的概括。

三是“选文以定篇”。

《文心雕龙》的“选文以定篇”，所选之“文”和所定之“篇”，主要是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而《中国文论话语导引》在诠释一个一个文论话语时如何“选文以定篇”？这是本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难题。中国文论话语是从大量文献中总结、归纳、概括、提炼或抽象出来，这些文献既包括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批评专书或专篇，也包括各体文学作品，还包括传世的经史子集和出土的简帛碑铭。更为复杂的是，某一个文论话语，并不仅仅出自某一篇文献；而先后（或同时）出现于不同文献的同一个文论话语，因其文本不同而释义有别。遇到这种情况，本书首先是选定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充分利用此篇章中的语义材料和思想资源，然后分“原始”和“表末”两个方向，论及相关的篇籍。比如风格论话语“文气”，既选定曹丕《典论·论文》作重点解读，同时在《管子》、《孟子》和《荀子》中“原始”，在《文心雕龙·养气》篇和韩愈《答李翊书》中“表末”。历朝历代的文论话语生于并活在特定的文本之中，故文论话语诠释的必由之路是返回文本现场：讲“言志”要回到《尚书》和《左传》，讲“虚静”要回到《老子》和《庄子》，讲“妙悟”要回到《六祖坛经》和《沧浪

^① 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存简 29 支，完简 1 支，约 1006 字。内容可分四类：第一类不见评论诗的具体内容，概论《颂》、《大夏》、《少夏》和《邦风》。第二类是论各篇诗的具体内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数篇诗为一组，一论再论或多次论述。第三类为单简上篇名纯粹是《邦风》的。第四类是单支简文属于《邦风》、《大夏》、《颂》、《少夏》等并存的。

诗话》，讲“知人论世”则要回到《孟子》和《文心雕龙·知音》。只有回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才有可能把握到中国文论话语鲜活的生命和深邃的内涵。

四是“敷理以举统”。

就中国文论话语的阐释而言，“敷理”与“举统”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敷者铺也，敷理谓铺叙、展开、排列、拓进等；举者取也，举统谓摄取、提炼、抽象、归纳等。对《中国文论话语导引》的理论阐释而言，“敷理以举统”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中国文论话语的产生，说到底是历代文论家“敷理举统”的结果；其次，中国文论话语的阐释，一个重要的路径或方法就是“敷理举统”。《中国文论话语导引》在“敷理举统”之时，“敷理”与“举统”这两个阐释方向或先或后，依阐释对象而定。敷理举统，或先或后，要在层次分明，路径通畅，步步深入，渐趋佳境。

本体论话语



哲学与文学

“哲学”一词，最初是古希腊语“philosophia”，原意是“爱智慧”。到了中国，便有了“哲学家”“哲学思想”等概念。但“哲学”一词的本义却一直未被中国人所接受。直到宋朝，程颐、朱熹等人才开始将“哲学”一词引入中国。他们将它译为“形而上学”（或“形而上之学”）。到了明朝，王阳明又将其译为“心学”。到了清朝，顾炎武、黄宗羲等又将其译为“理学”。到了近现代，梁启超、胡适等又将其译为“哲学”。但这些翻译都是从西方引入的，而不是从古希腊语中直接翻译过来的。

“文学”一词，最初也是古希腊语“literatura”，原意是“文字”。到了中国，便有了“文学家”“文学作品”等概念。但“文学”一词的本义却一直未被中国人所接受。直到宋朝，苏轼、欧阳修等人才开始将“文学”一词引入中国。他们将它译为“文人学士”（或“文人学者”）。到了明朝，王世贞、李攀龙等又将其译为“文人学士”。到了清朝，吴兆宜、王士禛等又将其译为“文人学者”。到了近现代，梁启超、胡适等又将其译为“文学”。但这些翻译都是从西方引入的，而不是从古希腊语中直接翻译过来的。

“哲学与文学”一词，最初是古希腊语“philosophia literatura”，原意是“爱智慧的文字”。到了中国，便有了“哲学与文学家”“哲学与文学作品”等概念。但“哲学与文学”一词的本义却一直未被中国人所接受。直到宋朝，程颐、朱熹等人才开始将“哲学与文学”一词引入中国。他们将它译为“形而上之学与文人学士”（或“形而上之学与文人学者”）。到了明朝，王阳明、顾炎武等又将其译为“心学与文人学士”。到了清朝，黄宗羲、王夫之等又将其译为“理学与文人学士”。到了近现代，梁启超、胡适等又将其译为“哲学与文学”。但这些翻译都是从西方引入的，而不是从古希腊语中直接翻译过来的。

“哲学与文学”一词，最初是古希腊语“philosophia literatura”，原意是“爱智慧的文字”。到了中国，便有了“哲学与文学家”“哲学与文学作品”等概念。但“哲学与文学”一词的本义却一直未被中国人所接受。直到宋朝，程颐、朱熹等人才开始将“哲学与文学”一词引入中国。他们将它译为“形而上之学与文人学士”（或“形而上之学与文人学者”）。到了明朝，王阳明、顾炎武等又将其译为“心学与文人学士”。到了清朝，黄宗羲、王夫之等又将其译为“理学与文人学士”。到了近现代，梁启超、胡适等又将其译为“哲学与文学”。但这些翻译都是从西方引入的，而不是从古希腊语中直接翻译过来的。

文 学

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获得了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官方授奖词是：鲍勃·迪伦在伟大的美国民谣传统中创造出新的诗歌意境。普通民众在调侃这一话题，而理论批评家在阐释这一结果。人们热议作为民谣歌手的迪伦是否具有取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以往，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局限于书本或铅字。但文学来源于生活，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在如今全媒体时代，我们感知生活的手段无限发达，当微博、微信、歌曲等新样式兼具文学性和情感性，也能表达生活体验时，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甚至读到的内容，是否属于“文学”？如果这些不属于文学，那文学有何独到的艺术特点，又该怎样认识其价值和使命？

一、释名彰义

(一)语义界定

“文”是象形字，其甲骨文像正面站立的一个人，胸前带有刺画的符号。许慎《说文解字·文部》：“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段玉裁注：“错画者，交造之画也。象交文，像两纹交互也。”由此可知，“文”的本义是图纹符号，指由线条交错组合而成的图案。“文”的现象广泛存在于自然万物中，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各种具有形构意义的组合都显示出“文”的基本特征。

“学”作为形声字，本作“學”，甲骨文“学”字像在符号两边加上爪与手，突出了手把手教导的语义。《尚书·大传》：“学，效也。近而愈明者学也。”《广雅》“学，识也”及“学，教也”。关键词“学”的本义指效法，钻研知识，获得知识。有时也作掌握知识(分门别类的有系统的知识)理解，凸显出学问、学识和学术的语义特征。

“文”与“学”组成了一个核心关键词“文学”。广义泛指一切思想的表现和以文字记叙的著作。狭义则专指以艺术的手法表现思想情感或丰富想象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等。这种语义特点影响着文学的文体风格和语言风格，促进了中国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及士大夫精神结构的重建。

(二)中西比较

文学观念是对文学本质或属性的认识，如何理解熟悉的文学现象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属于人类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文学”的现代语义则指用语言文字塑造艺术形象以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感

情的审美艺术。中国文学是一个语义丰富的体系，包含许多“纯文学”与“非纯文学”的主题，有整套与西方话语不同的理论术语。中国文学是“文章”体系，表现出一些多义性的特点，注意主客体的和谐，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它是在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中国文学中，除却中西文学观念所共同接受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文体，尚有丰富多彩的词、赋、书、诏、策、奏、启、表、铭、箴、诔、碑等文体。中西比较，英语关键词 literature 或 text 很难在文体上与语义丰富的中国文学观念相对应，它们言说“文学”的语义空间相对较窄。雷蒙·威廉斯基《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指明“literature”是在 14 世纪时出现在英语词汇中的，其语义是“通过阅读所得到的高雅知识”^①。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1800 年之前，literature 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②中国“文章”体系与西方 literature 语义在结构上指向了如何言说“文学”，其词义演变实现了新时期中外文论的对话和交流。

二、原始表末

“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论语注疏》宋邢昺释义：“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这里的“文学”语义广漠无垠，涵盖了当时的学问和书籍，泛指一般的文化学术，具有尚文、尚用的文辞特点。《墨子·非命中》：“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总结先秦的文学观念时说：“文学者，以其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举凡文字书写且有结构法式的作品，皆可称之为“文学”。先秦时期的“文学”观念，具有宽泛、含混的语义特点，距离今天的审美观念相去甚远。当时虽产生了文、史、哲等著作，但只有少数“兴观群怨”的诗歌具有“纯文学”审美意识。

到了两汉，文学观念上承先秦而有所变化。由于散文和辞赋的文体演进，“文学”一词出现了文章和学术的语义分离，人们认识到文辞的审美特征。汉武帝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之科目，此时“文学”指精通儒家经典的文士，注重经典的言辞特征。两汉之际，学术著作被称为“博学”或“文学”，儒术、掌故、律令、章程等皆是文学。《史记·孝武本纪》：“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史记·儒林列传》：“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词章之作被称为“文辞”或“文章”，中国文学是“文章”体系，凸显出了文辞的审美意识，“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史记·儒林列传》）。

魏晋南北朝时，“文学”产生内部概念的转变，不再倾向指学术、学问，而成为语言艺术的专用名词，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里虽然没有具体言说“文学”一词，但其描述的是“文学”现象，一种

^① [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第 268 页。

^② [美]乔纳森·卡勒著，李平译：《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22 页。

具有审美意识的文辞作品。范晔《后汉书·文苑传》为“文学”立传，时称“文章”或“文学”，其《文苑传赞》称：“情志既动，篇辞为贵。”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专门立传探讨“文学”，在篇内时称“文章”：“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此所谓情志、情性是文学本质，而篇辞、律吕是文学形式。《梁书·简文帝纪》记载东宫文学的盛况：“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此标志着“文学”观念从泛指文化学术开始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文学”一词在隋唐、宋元、明清阶段进入到折中的语义范围，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及传记、书札、史论等散文。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原本的学问基础发生了变化，此关键词“文学”作为专门的知识结构，俨然已是中国社会衡量文人的价值标准。白居易《策林·议文章》云：“国家化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学，二百余载，文章焕焉。”以及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道：“而世之知师鲁者，或推其文学，或高其议论，或多其材能。”此所谓“文学”指博学的知识结构，以及在诗文等领域的创作情况。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此所谓“文学”已经是折中的文学观念，在文体、风格等层面较近“纯文学”或“美文学”。

在“明末清初”“晚清民初”两个时段，中国社会产生了“西学东渐”的现象。与此同时，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也输入到中国。“文学”一词作为语言艺术的意思始于 1917 年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发起的“文学革命”。此词据日文翻译 literature 转译而来，带有“侨词”的特征。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文学”一词并非取自“文学子游、子夏”，是“从日本输入的，是他们对英语 literature 的翻译词”。朱希祖《文学论》亦说：“自欧学东渐……吾国各种学术……分立专科，不得……至于文学，在欧美亦早离各学科而独立。”胡适先生在《什么是文学》中将文学的特征概括为“明白清楚”“有力动人”与“要美”。今天作为学科和用于指称语言表达艺术的“文学”，是近代西方文化输入后形成的概念，与传统“文学”概念虽有联系，但存在明显区别。^① 这说明中国“文学”观念在“西学东渐”之时经历了古今转换与中西涵化，演变为用以表述学科门类的独立称谓，并指称以语言文字为表达方式的艺术。

随着学术体制的调整和变革，新时期的“文学”观念呈现多元化的局面。时至今日，伴随着技术手段和审美批评的转变，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群体、写作追求和阅读需求，带来了类型化的文学观、游戏化的文学观和商业化的文学观。当前“文学”概念在创作中产生了新的话语（作品、作者、世界、读者），在风格与文体上都有所调整，不再是笼罩群言的宽泛观念，而指中西涵化的主流文体（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新时期出现的武侠连载、网络文学、奇幻文学、童话动漫等，以及某些先锋诗歌、小说、散文等文体，举凡一切语言文字皆在文学范畴之内。尤其是瑞典文学院选择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就是在通过他的“歌词体”去引导文学观念的确立，这是对“文学”概念的语义拓展。面对诸多新元素（美学、伦理、音乐、舞蹈、绘画）的挑战，以及艺术的反思与重构，20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学”观念面临“边缘模糊、内涵重合”的多义情况。过去的审美经验已经瓦解，新的主体经验尚在探索，此时“文学”如何守住传统的艺术经验，如何确定主体

^① 余来明：《“文学”概念的古今演绎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